

目 录

毛主席是俺纺织工人的大救星

——青岛国棉四厂老工人庄立山讲家史…………… (1)

纱线千尺恨万丈

——青岛国棉九厂张崇珍的家史…………… (17)

纱厂艺徒话当年

——访青岛国棉九厂退休老工人…………… (36)

纺织工人斗争片断…………… (54)

毛主席是俺纺织工人的大救星

——青岛国棉四厂老工人庄立山讲家史

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遭受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黄连苦，没有我们穷人的生活苦；黄海深，没有我们穷人的冤仇深。我家那血泪斑斑的历史，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离 乡

我老家原是山东苍山县，祖祖辈辈给地主郑昌言当佃户。从我记事起，家里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地，只有三间夏不遮雨、冬不挡寒、用碎石垒起来的小破屋。全家六口人，有爷爷、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我。爷爷带着父亲和哥哥一年到头拚死拚活地给地主种地，我和姐姐跟着母亲给地主做饭。一家人累断筋骨、流尽血汗，养肥了地主一家，可我们全家还是过着早晚两顿稀菜汤，中午一顿糠的苦日子。家里穷得连床破被子也没有。

我四岁那年秋天，母亲生下小妹妹还不到三天，地主郑昌言就硬逼着她去做饭。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起五更睡半夜，泡粮食、推磨……十几口人的饭，都是她一个人做，再加上其他杂活，一天到晚没有个闲时候。刚生过孩子的母亲，哪能经得起这般繁重的劳动啊！不几天，她就累倒瘫痪了。狠心的地主看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母亲再也不能为他卖命了，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们全家赶了出来。爷爷一气之下，便去找郑昌言讲理。在那吃人的旧社会，一千个理，一万个理，哪有咱穷人的半个理啊！郑昌言狗眼一瞪：“我家不养吃闲饭的！”说着把爷爷赶出大门。爷爷又气又恨，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含着深仇大恨死去了。

爷爷死后，日子就更艰难了。母亲瘫痪在炕上，哪里有钱医治呀！父亲看看全家，万般无奈，只好又租了地主王四的七亩山岭薄地。一家人整年泡在地里，好不容易盼到秋收，可是，全家一年的血汗，不但没有填满地主的口袋，反倒欠下了王四四升租子。父亲拿着空空的破口袋，眼巴巴地望着全部装进地主口袋里的粮食。这时，王四“嘿嘿”地奸笑着走过来，拍着父亲的肩膀假仁假义地说：“四升租子嘛，不要紧，今年还不上明年还嘛！”父亲望着王四，透过那

副狡猾的面孔，看清了他那蛇蝎心肠，他是要给个死扣套在我们穷人的脖子上，把我们一步步拉向死路啊。父亲越想越气，冲口说道：“地，我不种了！”

“不种了？”王四冷笑了两声，“没那么便宜，欠我的租子，就得给我种地！”

那年月，欠下地主的租子，就等于背上了还不清的阎王债。父亲看看屋里实在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两岁的小妹妹饿得在炕上直打滚。大人能吃糠咽菜，可小孩怎么活呀！父亲坐在炕沿上，发呆地看着炕上张着小手要东西吃的小妹妹，眼里闪动着泪花，狠着心想把小妹妹卖掉，一来给她找条活路，二来用这钱还上地主的欠租。当父亲跟全家一说，母亲便把小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家人围着小妹妹放声痛哭。我抱着父亲的腿在地上哭喊着：“爸爸呀，爸爸，你不能卖小妹妹呀……”父亲的眼泪簌簌地落在我的头上。母亲哭着说：“咱就是爬着出去要饭，也要拉扯着孩子一块过。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颤抖着的父亲，看着痛哭的母亲也泣不成声。过了好一会，他才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心狠，实在是被地主逼得没法啊！”我扯拉着父亲的衣角说：“爸爸，我去给地主放牛顶债，不要把小妹妹卖掉。”

就这样，我刚满九岁，为了凑钱还债，就到离家

十七里路的太和庄，给地主王春祥放牛。刻薄的王春祥看我人小，一年只给四块钱的工钱，还硬逼着我父亲在字据上划押。字据上写着“一年不准回家，不足一年不给工钱，误伤、疾亡，雇主概不负责”等。父亲拿着字据沉思了半天，明知是火坑，也得跳啊！他忍着搅心的痛苦，颤抖着松树皮一样的手，含着眼泪，按了手印。这哪里是什么字据，明明是我的卖身契！从此，我便成了地主王春祥的小奴隶，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

有一次，我在坡上放牛，地主的狗腿子硬说牛啃了他的庄稼，拣起一把带刺的树条子，朝我没头没脸地抽过来，打得我浑身道道血痕，青一块、紫一块。我忍着疼好歹把牛赶到一块，等到太阳落了山，才敢回家。

晚上，老天下起了暴雨。我躺在牛棚里，摸着身上的伤痕，偷偷地哭着。越哭越伤心，越哭越想家。牛棚外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强忍着疼痛，摸出了地主的家门，顺着崎岖的山路，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半夜才回到家。一进门，看到全家人，我满肚子的委屈不知打哪说起，便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母亲含泪擦着我的伤痕。惊雷震天，盖不住穷人的愤怒；大雨倾盆，冲不净穷人的血

泪！

当夜，哥哥把我背回太和庄。天还没亮，我就被王春祥踢醒了。他板着脸，阴沉沉地站在我身边：

“晚上到哪儿去了？”

“回家拿鞋啦。”

“怎么不告诉老子就偷跑？”他贼眼一动不动，死死地盯住我。

“告诉你怕……”没等我说完，一个巴掌打过来，我只觉得耳朵“嗡嗡”响，鼻子窜出了血，火辣辣的脸顿时肿了起来。打完后，他连饭也不让我吃，又逼着上山放牛。打那以后，地主更是天天找岔子，不是打就是骂。

一家人累死累活地干，到了秋天，总算还上了四升租子。终日辛苦终日愁，一年血汗两手空。熬啊，盼啊，熬过了冬天，盼来了春天，能吃的树叶都采光了，能吃的野菜也都挖尽了。父亲和母亲看看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心想，不能在这里等死，出去讨饭，兴许能寻条活路。父亲就找来一担破筐，一头坐着妹妹，一头装着全家的破烂家当。我和姐姐搀扶着母亲，一家人一步艰难一步恨，含着眼泪离开了家乡。

地 狱

我一家在高密整整流浪了三年。一九三七年，全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青岛。在穷哥们的帮助下，全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栖身的地方。父亲和哥哥给包工头拉木板车，他们风里来，雨里去，跑断腿，累断腰，也挣不上全家的吃喝。母亲和妹妹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去讨饭，我和姐姐就到街上垃圾堆里拣煤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青岛。日本资本家在青岛盖起了一座座厂房，铺修了一条条马路。这座座厂房，哪一座不是穷人的白骨垒成？！这条条马路，哪一条不是穷人的鲜血铺成？！七七事变后，卖国贼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拱手把大片土地让给日本帝国主义，青岛就陷入了更深的苦海之中。

日本纱厂的资本家，为了从中国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他们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徒工进厂得送“进厂礼”。邻居看我家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就七拼八凑凑了三块钱，托人把我姐姐送进了隆兴纱厂（现青岛国棉三厂）细纱车间当了学徒工。我也想进厂，可是哪里再去弄这三块钱？为了减轻母亲的生活担

子，我就自己跑到工厂去验工。说去验工，哪有那么容易？十几岁的小孩子，加上长期缺吃少穿，个子长得又瘦又小，去了几次，跑了好几个工厂，都还没验上。一天，在工厂门口我看见好多童工，胸前用彩色粉笔画着粗粗的圆圈，心想，准是个验工的记号。我便拣了几块粉笔头，装进衣兜里，趁把头不注意，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个大圆圈，硬是冒着危险，跑进了徒工的队伍。就这样，我进了大康纱厂（现青岛国棉一厂），在织布车间当了学徒工。当时我心里高兴极了，恨不得一步跑到家中跟父母报个“喜”。

那知进了日本纱厂，就象进了地狱，死不了也得脱层皮。工人每天要做十四、五个小时的活，早晨五点钟进厂，去晚了就挨打，下班后还得搜身。

资本家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为了榨取高额利润，拼命提高劳动强度。车间里没有任何安全设备，工人们一天到晚在飞速转动的机器旁边操作，有的被机器截去了胳膊，有的被轧得粉身碎骨。中午没有吃饭时间，工人们只好边接线头，边扒一口冷饭。车间里劳动条件极差，到处飞花乱舞，纷纷扬扬，整天象下雪似的。工人们嘴里、鼻孔里都是花毛，脸上被花毛粘得象蛆爬一样难受，一天工做下来，身上的花毛可以成片往下揭。车间一年四季闷热难当，尤其到了

夏季，资本家为了使车间保持一定的湿度，把门窗关得严严的，车间温度经常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整个车间象一个大蒸笼，一进车间，就闷得喘不过气来。工人们光着脊梁赤着脚，浑身起满了热疙瘩，汗水一渍，象针扎一样疼痛难忍。实在没有办法，就在身上抹一些白粉子。劳动一天，粉子、花毛粘满身，简直不象个人样。

工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拚死拚活地干，但得到的工钱却少得可怜。一个工人每月要干四百多个小时的活，领到的工钱仅仅能买到两袋橡子面。就是这点工钱，资本家也不让工人全拿到。他们规定：织了三等布罚钱，因事请假罚钱，丢失了劳动工具罚钱……花样多得很，七折八扣，工人真正拿到手的钱就更寥寥无几了。资本家还规定：工人请假满一个星期的开除，有病的开除……各种戒令，就象一条条毒蛇缠在工人身上。这还不算，工人们还要遭受资本家、包工头的任意欺凌、打骂。车间除了日本领班外，还有大把头、二把头、狗腿子，分布在各个车间，监视工人劳动。织布车间的把头王才，整天棍子不离手，象个凶神，对我们徒工又狠又毒。他到车间，故意找岔，看谁不顺眼，不是打就是骂；见了日本领班，却象哈巴狗一样，点头哈腰。我进厂的第一天，王才就宣布

了“三不准”：喝水吃饭不准离开车间，不准随便活动，不准和工人师傅说话。我们整天累死累活地干，总是不顺王才的眼。有一次，我正学着接线头，王才走过来检查，硬说接得不合规格，嘴里骂着，抬手“啪啪”打了我两个耳光。我眼前冒金花，耳朵嗡嗡响，血顺着鼻子淌了下来。这样的事，在大康纱厂哪天没有哇！我受不了这种非人生活的折磨，只得从大康纱厂转到了丰田纱厂（现青岛国棉四厂）。在万恶的旧社会，大康是地狱，别的纱厂也不是天堂！在丰田，我又忍受了十几年同样的煎熬！

深 仇

在日本纱厂，男工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已经够残酷的了，而女工遭受的折磨和侮辱比男工还厉害。我姐姐当了隆兴纱厂的徒工后，在细纱车间学挡车、接线头。刚进厂，姐姐人小手生，一看见纱头断得多了，心里就发慌，经常因接不好一个纱头，被封建把头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一次，姐姐跟着一个工人师傅学接纱头，老远望见巡班的把头走过来，吓得她心里蹦蹦直跳，手也哆嗦，一不小心，弄断了几个纱头。把头见了，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不容分说

一顿拳打脚踢，姐姐当场昏倒在地。等姐姐慢慢苏醒过来，狠心的把头又逼着她干活。就这样，姐姐一天到晚站在机器旁边，常常一边干活一边流泪，眼睛都哭肿了，时间一长，眼睛就逐渐模糊、看不清纱头了。父亲见姐姐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心疼地让她在家里歇几天。没想到姐姐歇了不到五天，资本家就贴出布告，说我姐姐无故旷工，把她开除了。姐姐听说被开除，满腔的怒火涌上心头，越想越气，慢慢双目就失明了。

姐姐眼瞎了，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就更重了。全家只能吃点臭粉渣子，这种臭粉渣子，现在连猪都不吃，只能用来做肥料。可是那时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工人，不用它来糊口又吃啥呢？就是这个，工人们还得每天清晨三点钟去排队挨号，才能买到。为了全家的几张嘴，父亲冒着风雪雨露，整天在外拉车。那年已是深秋，清晨起来，寒气逼人，父亲还光着脊梁，穿着裤衩，赤着脚，拚命地拉车。一天，他拉着满满一车货，沿着一个陡坡艰难地爬着，豺狼般的日本兵开着汽车横撞过来，把父亲撞倒在地。日本兵狞笑着开足马力，扬长而去。父亲血流满地，幸亏几个穷工友用车把父亲送回了家。家里穷得没有半文钱，哪里有钱给父亲治伤？一家人围着父亲哭得死去活

来。父亲躺在炕上起不来，全家生活更陷入了绝境。十二岁的小妹妹看着躺在炕上的父亲，再看看双目失明的姐姐，心想全家可怎么过下去啊！她便跑到母亲跟前说：“娘，我也到工厂做工去。”母亲望着小二嫂那副认真的样子，再看看她那骨瘦如柴的身架，真是心如刀割。为了让妹妹能讨口饭吃，母亲只好同意她到大康纱厂去验工。明明知道资本家的工厂大门，是吞噬劳动人民的血盆大口，怎能忍心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再到虎口去受罪呢？看看全家，实在是无可奈何呀！

妹妹入厂后，资本家根本不让她学技术，每天十四、五个小时在车间里扫垃圾、擦地板、干杂活，经常遭受把头的打骂、折磨。一次，妹妹上厕所，不防被一个姓张的把头发现，便跟了进去，硬说妹妹偷懒，一把将妹妹按倒在地上，用脚踩着她的辫子，抄起旁边的一个纱筒没命地毒打。妹妹昏过去了，把头还不放手。这时候，工人们闻讯赶来，围住把头责问：“你凭什么打人？”狗把头一看事情不妙，便灰溜溜地走了。工人们把小二嫂送出了门口。她爬呀，爬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家，进门一头扎在炕上，就起不来了。妹妹挨了打，还不敢跟母亲说，母亲问急了，只说身体不舒服。我回到家里，扶起妹妹，一摸

头热得烫手，再摸摸身上，血糊糊的，便问：“小二嫚，又挨打了？”妹妹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嘴里只“嗯”了一声，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滚了下来。

资本家把妹妹打成这个样子，我仇恨的怒火涌上心头，新仇旧恨连成一串，再也忍不住了，非要去找狗东西讲理。可那个世道，哪有咱穷人讲理的地方呀！母亲、姐姐怕我闯出祸来，急忙拉住了我。我强压住心头怒火，守在妹妹身旁，妹妹浑身烧得烫人，嘴里不住地说胡话。到了深夜，进工厂才二十八天的小妹妹，一个工钱还没拿到手，就被那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生命。

十二岁的妹妹，自出生以来，只吃了几个月的奶水，是姐姐用稀粥一勺一勺把她喂大的。双目失明的姐姐听说妹妹死了，摸到妹妹的身边，一头扑在她身上，边哭边叫：“妹妹呀！妹妹！”可是妹妹再也听不见姐姐的声音。父亲拖着伤腿喊着：“小二嫚，小二嫚，我苦命的孩子呀！”几次昏倒在地上。邻居们从我家炕上揭下一块破席头，含恨把妹妹卷了起来，抬出屋去。父亲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拿着从老家逃荒时挑妹妹用的扁担追出屋来，哭喊着：“小二嫚，小二嫚，你上哪儿去呀？你们把我的小二嫚弄到哪里去啊？”母亲晕倒在门口，姐姐张着两手扑在门框

上，拚命地哭喊着：“妹妹，妹妹……”我强忍着眼泪，握紧拳头，心里骂道：“资本家、狗把头，你们等着吧，总有一天要跟你们算账！”没多久，我那双目失明的姐姐也含恨离开了人间。

一仇未报，又添新仇。这笔笔血债，我牢牢记在心里。

翻 身

长夜催日出，隆冬迎春来。青岛市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子弟兵解放了青岛。这一天，金色的太阳驱散了笼罩在胶州湾上空的乌云，青岛市显得格外壮丽，海蓝山青，人欢民乐，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我这个一直被地主资本家踩在脚下的臭苦力、穷工人，第一次挺直腰杆参加了昂首阔步的工人游行队伍，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热烈庆祝青岛市解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青岛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了，我打心眼里感激党和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

一家。当时我在仓库当搬运工人，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除了每天超额完成装卸任务外，下班后，特别是在刮风下雨和盛大节日的夜晚，我总要到仓库的周围去转一转，看一看，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平时，工作再累，我也觉得十分愉快，因为现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了！不久，我被调到厂保卫科工作。在那里，我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一九五一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这是一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阶级斗争。我积极投入了这场政治运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和广大工人一起，经过内查外调，挖出了潜伏在厂里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并协助公安部门清查出改名换姓钻进工人队伍的地主还乡团分子。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许多荣誉。让我两次出席了市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连续三年被评为厂的先进工作者。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我心中无比激动，旧社会受欺压的“花毛虫”，今天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有满肚子的话想对党和毛主席讲，可是千言万语又不知从哪里说起，我举起了右手，握紧拳头，庄严地向党表达了从内心迸发出的誓

言：我一定把一生献给党，献给人民，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始终和广大工人一道，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部署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一小撮阶级敌人，出于他们的反动本性，丧心病狂地跳出来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破坏活动。我厂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气势汹汹地跳出来要翻案，并找我重新给他定成份。我当即跟他进行了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通过这次大革命，我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比英明正确。没有毛主席，没有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我们这些旧社会的受苦人，难免要受二遍苦、二茬罪。

解放后，我一家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主人，在经济上、文化上也翻了身，日子越过越红火。现在我全家五口人，爱人是老工人，已经退休，两个大孩子也参加了工作，最小的一个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到农村。我们住的是明亮宽敞的楼房，吃穿有余，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样样俱

全。

想想过去的苦难，就好象寒冬腊月喝冰水，点点滴滴都寒心；看看现在的幸福生活，真如吃着甘蔗上楼梯，步步高来节节甜。我深深懂得，千年的苦根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拔掉，万年的甜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开拓，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将世世代代铭记他老人家的恩情，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革命到底！

纱线千尺恨万丈

——青岛国棉九厂张崇珍的家史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

每当听到《东方红》的歌声，张崇珍师傅的心里，就象大海的波涛一样翻滚起伏。他站在毛主席的遗像前，仰望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深情的话语，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来：毛主席呵毛主席，是您使我们这些在旧社会当牛做马的奴隶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又是您领导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您永远活在我们纺织工人的心中！

张崇珍是青岛第九纺织印染厂织布车间的工人。现是长日班的党支部委员、车间保管员，今年五十九岁了。他爱毛主席，爱得深切；他走毛主席的路，走

得坚定。这是因为他没有忘记旧社会的苦，时刻铭记着毛主席的恩情。

在旧社会受煎熬的张崇珍，永远也不会忘记那苦难的岁月。

(一)

张崇珍出生在临沂县沿上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十一口人：祖母、父亲、母亲、一个哥哥、三个弟弟、三个妹妹。全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糊口。崇珍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和哥哥下地干活，跟着母亲四处讨饭。一家人累断筋骨，流尽血汗，到头来一年的收成大部分倒进了地主的谷仓。崇珍十岁那年，父亲求亲告友，托人作保，好不容易把崇珍的哥哥送进临沂城的一家丝线厂当了徒工。本想这下可找到了一条生路，谁知进厂不到两年半，哥哥就被凶狠残暴的资本家折磨死了。哥哥死后，家里的日子就更难熬了，崇珍爹整天拚命地干哪、干哪，可怎么也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再加上那繁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象蝗虫一样飞来，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

一九三二年，崇珍已经十三岁了。一天，父亲把崇珍叫到跟前，抚摸着他的头，眼含泪水对他说：

“孩子，不是你爹心狠，实在是家里没法过啊，听说潍县有人开布场，雇人做工，你出去闯闯，兴许是条活路……。”崇珍一听，便哭着说：“我不，不……不去。”可是不去又怎么办呢？总不能在家等死呀！崇珍只好含着眼泪，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告别了亲人，踏上了自己谋生、坎坷不平的小路。

崇珍和伙伴们一起，一路讨饭来到潍县，落脚在一家姓刘的大地主开设的布场里。说是布场，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小作坊，一溜破草棚安着十几台又老又破的木织布机。正在织布的几个师傅听说他们来找活路，苦笑着说：“保你们死不了也得脱层皮。”这个布场的老板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大恶棍，上通官府，下欺百姓，无恶不作，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刘阎王。崇珍他们几个被叫到一间上房里。屋里坐着一个身穿长袍，手拿水烟袋，满脸横肉的胖老头，这就是大地主刘阎王。只见他瞪着两只野狗似的红眼，把他们上下瞧了个遍，然后便落在了崇珍身上。

“你多大了？”刘阎王问。

“十三。”崇珍小声答道。

“太小了，太小了，是来干活还是来白吃饭？”

“掌柜的，别看这孩子小，可身子骨挺结实，干·得了。”同来的一个叔叔说。

刘阎王待了一会儿才假惺惺地说：“那就试试吧，我刘某向来慈善，最讲‘仁义道德’。不过可不许偷懒耍滑。好了，明天就拜师干活。”

崇珍从此开始了徒工生涯。由于他年龄小，叫他做辅助工，帮着师傅擦车、拆线、绕线、扫地。额外还得给老板娘哄孩子、洗尿布、烧火做饭，整天累得晕头转向。就这样拚命干，连顿饱饭也吃不上，又碜又小的地瓜面窝窝头，每顿只给两个。崇珍盼望早日学点技术，可是，刘阎王总不让他上机，他只好偷偷地向师傅们请教。不久，崇珍就学会了织布。一次，他干完了杂活，就跑到一个师傅面前说：“师傅，我试一下吧！”刚上织布机还没蹬几下，刘阎王来了。他一看崇珍在织布，不由分说“啪啪”就是两个耳光。“妈的，滚下来！把我的织布机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过了半年，崇珍才上了织布机。

草棚里，十几架织布机单调地“喀哒喀哒”地响着，织布工人用双脚拚命地踩着踏板，双手不停地换梭子，一点空也没有。崇珍个子小，平时又吃不饱，踩不了几下子就累得张口气喘，两腿酸软，黄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往下落。就这样也不能停下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就溜进来督察。一天下来，浑身就

象散了骨架一样，软绵绵的，连路都走不稳。有一次，崇珍实在支撑不住了，一头晕倒在织布机上。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醒来，睁眼一看，刘阎王的大儿子凶神似的拿着一根棍子朝他没头没脸地打来，嘴里还干不净地骂着：“我叫你这小滑头偷懒！”可怜的小崇珍哪能经得住这样的毒打呀，开头还能哭喊几声，后来就昏迷过去了。直到工人们围过来，这小崽子才罢手。

刘阎王听到吵嚷声也赶来了。众人立即把他围了起来，提出要让崇珍休息两天。刘阎王看着愤怒的人群，便狡黠地眨了眨那对小眼说：“诸位息怒，我刘某向来宽宏大量，从不计较这些小事，算了算了，都干活去吧！”“不行！”工人们怒吼着，“不答应就甭想叫我们干活。”慑于众人的威力，刘阎王不得不答应了。

寒冷的夜晚，西北风吹得破草棚子哗哗作响。崇珍躺在冰凉的破草席上，浑身火烧火燎的，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了家，想起了哥哥，一幕幕惨景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去年临到年底的一个晚上。天，阴沉沉的，没有一颗星，乌云大片大片地从西北方向涌来，预示着不久要有一场大风雪。崇珍一家火挤在炕头上，围

着一盏萤火虫似的小油灯，焦急地等待着哥哥回来。崇珍几次跑到门外观望……

起风了，下雪了，窗前干枯的小枣树上，披上了白白的绒毛。忽然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带着一股冷气扑进了家门。“娘！”喊声刚落，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哥哥！”崇珍急忙跳下炕去。当他拉起哥哥一看，简直使他惊呆了。只见哥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胳膊和腿瘦得象麻杆，肚子肿得却象个大冬瓜。全家人一看，都心疼地哭喊着。父亲赶忙到邻居家借来一碗米，熬了点汤给哥哥喝了，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崇珍哥怀着满腔愤怒，断断续续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崇珍的哥哥自从进了丝线厂，整天是干不完的活，受不完的罪。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烧火做饭、扫地、洗尿布、哄孩子，大大小小的杂活，一天要干十几个钟头，稍不如老板的意，不是打就是骂。这次，他从早晨四点钟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多，实在累坏了，便一头扎在炕上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师傅们看他昨天太累了，没忍心叫他，谁知这一下可闯下了祸。老板来查房，一看崇珍哥还没起来，揪着耳朵拖起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他鼻口流血，并罚他赤脚站在雪地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经得住这样的折磨呀，不

久便得了病。老板不但不给治，还逼他照样干活，后来看他实在不行了，才把他放了回来。

过了一个多月，哥哥的病稍微好了一些，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又挣扎着去上班。可是，打这以后，哥哥再也没有回来……

崇珍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地打了个寒颤。黑心的老板吃掉了哥哥，刘阎王也会吃掉我的。与其等死，还不如回家。崇珍咬了咬牙想爬起来，可一动浑身就象针扎一样的疼。他恨呀，恨死了吃人不吐骨头的刘阎王，恨死了这不平的世道，他恨不得一拳把刘阎王和这不平的世道砸个稀巴烂！

这样的日子熬过了九个月，崇珍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个深秋的夜晚，他和同来的一个伙伴，满含着阶级的仇恨，双手空空地逃出了刘阎王的大门……

（二）

崇珍风尘仆仆，步行五百里回到了家乡。

家里依然是穷得锅底朝天。父亲一人怎能养活全家十口？为了生活只好又租了地主的几亩薄地。崇珍和父亲整天泡在地里，家里却依旧是清水煮野菜。崇珍十七岁那年，爷儿俩辛辛苦苦种上的谷子抽穗了，

长势也很好，一家人都挺高兴。谁知连续几天狂风大雨，把谷子全部砸进泥里，一年的收成全完了，全家的希望化成了泡影。父亲一急之下得了重病。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狠了狠心把祖辈传下来的一亩地卖了，钱没到手就被地主全部抢走了。

这一下可怎么活呀，全家整天愁得唉声叹气。在家是没法过了，崇珍便和父亲商量着要出去逃荒。听人说，青岛工厂多，活路广，兴许能混口饭吃。可是年迈的祖母去不了呀，父亲只好让崇珍带着母亲和五个弟妹走，自己留下照顾祖母和最小的弟弟。这时正是一九三六年的秋天。

崇珍带着母亲和弟妹离开了家乡。一家七口，一边讨饭一边赶路，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青岛沧口大翁村。在一个穷乡亲的帮助下，好歹凑合着支起一间破草棚子，算是安了家。

家算安下了。可是，要在这厂连厂的地方，找一个工作却实在不容易。崇珍和两个妹妹一连跑了十几天都没验上工。一次，富士纱厂（现青岛国棉七厂）招工，崇珍兄妹三个从早上五点钟就在门口等，一直等到八点多钟才出来一个尖嘴猴腮的工头，在人群里东挑西选。当挨到崇珍时，这个家伙连看也没看便把他推到了一边。崇珍急了，赶忙上前：“先生！”工

头回过身来，不等崇珍说完，就蛮横地打断：“咋？你这么个干巴人，还想来验工？去去去，不收痲病鬼。”

崇珍赶忙说：“先生，我没病，能干，我……”

“滚蛋，再罗嗦就揍你。”工头蛮不讲理地举起拳头。

崇珍气愤极了，牙咬得格格响。这是什么世道！等了半天不但没验上，还挨了一顿骂。两个妹妹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以后又经过许多周折，崇珍总算进了钟渊纱厂（现青岛国棉六厂），两个妹妹也进了富士纱厂。从此，崇珍兄妹三人，在资本家的压榨下，过着暗无天日、人间地狱的生活。

清早，大约四点多钟，母亲就把崇珍兄妹三个喊起来，喝口热水就往厂里跑。厂方规定，五点半开门，六点关门，过时不准进厂，一天不干就要扣三天的工钱。穷工人连饭都吃不上，哪能买得起表？寒冬腊月，当资本家还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发财的美梦时，崇珍兄妹三个已和一大群衣不蔽体的穷工人，迎着刺骨的寒风去上班了。

一进纱厂，更是痛苦难言，资本家的心只在钱眼里翻跟头，那管穷人的死活！为了赚钱，强迫工人每



天劳动十二小时至十六小时，连吃饭也不给时间。厂里规定吃饭不准关车，工人们只好将菜团子放在车头上，巡回一趟啃一口，一会儿菜团子上就落上一层花毛。真是不吃肚里饿，吃下泪成河啊！盛夏，车间里尘絮飞扬，蒸汽如雾，不但没有通风设备，门口还挂上一层厚厚的门帘，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工人们汗流浹背，却捞不到一口水喝，许多人常常干着干着就晕倒在车旁。这还不算，那些穿着大皮靴的日本领班，拿着皮鞭的把头，象饿狼一样，整天在车间里寻事。工人稍不留意，就会横遭一场大祸。一次，崇珍正患感冒，高烧烧得他浑身软绵绵的，走路都困难，再加上棉纱不好，这台车刚开起来，那台车又停了。正在这时，一个叫傅永斋的把头走过来。

“他妈的，你这小子想磨洋工是怎么的？”说着恶狠狠地朝崇珍身上连踢三脚。

“你怎么打人，我……”崇珍愤怒地说。

“‘我’什么？我看你这小子是找挨揍。”说着，傅永斋又撸起了袖子。一个老工人一看事不好，赶忙走过来，拉开了崇珍，接着架着傅永斋的胳膊说：

“这孩子刚来，不懂得厂里规矩，请别见怪。”好说歹说，傅永斋才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崇珍才免了一场灾难。

资本家为了进一步统治工人，他们挖空心思订立了各种厂规。这些厂规就象毒蛇一样紧紧地缠在工人们身上。工人干一天活，累得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却还得在门口挤一两个小时，等着搜身。资本家豢养的那些把头和搜身婆就象凶神一样，要是他们发现谁带走厂里一点东西，谁就要大祸临头。一次，崇珍下班回来，老远就听到家里有哭声，他心里一怔，就赶紧往屋里跑。进门一看，只见大妹妹趴在娘怀里，衣服一缕一条的，脚冻得发紫，破了的地方滴着黑血。原来，崇珍妹妹的鞋破得穿不住了，她便拾了一点烂纱把鞋绑了绑。下班时她忘了解下来，被搜身婆发现了，拖出来就是一顿毒打，还把烂纱使劲往她嘴里塞。旁边一个日本把头过来用钉子鞋拚命踩她的脚，疼得她满地打滚。看到这些，在场的工人个个气得两眼冒火，怒不可遏，围上去就要揍他们。日本把头和搜身婆一看事不好，罚了妹妹三天的工钱，这才把她放了。“搜身制”害苦了我们多少工人啊！崇珍看着妹妹被折磨成这个样子，肺都要气炸了，他真想去和那些家伙拚了。可是，在那种世道哪有咱穷人讲理的地方！

工人们为资本家拚死拚活地卖命，工资却少得可怜。再加上大小把头层层盘剥，工人实际拿到手的工

钱就更少了。有一个月，崇珍一个班没缺，只领到了两块钱。他愤愤地去找账房先生，账房先生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扣钱的原因：织次布一匹罚，停电三小时扣，来晚一次扣，未经批准上茅房两次罚，顶撞把头一次罚……，更有甚者，连和一个工人开了句玩笑也罚。

在资本家的层层盘剥下，工人的生活猪狗不如，一家人天天三尺肠子缩着二尺。年幼的弟弟和妹妹饿得皮包骨头，为了能找一点充饥的东西，天天在李村河边的垃圾堆上拣点菜叶子。这样的日子，熬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青岛沦陷，工厂倒闭，企业萧条，物价飞涨，马路上到处挤满了失业的人群，崇珍兄妹三个也失业了。生活更加困难了。看看在青岛实在过不下去了，娘儿七个只好离开青岛，返回家乡。

（三）

一九三七年年底，崇珍娘儿七个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家。

家，哪里还有什么家？那间破烂不堪的小草棚早已化为灰烬，村子里到处散发着日本鬼子烧杀后的焦

臭味。奶奶、父亲和弟弟也不知哪儿去了。崇珍娘一看这惨景，心如刀搅，眼泪顺着消瘦的面颊往下淌。为什么天地这样大，竟容不下我们这些穷人？为什么世上大路千万条，就没有我们穷人的路一条？

过了些日子，他们才找到了父亲、奶奶和小弟弟，在原来的废墟上又支起了一间小草棚。

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地主恶霸的残酷压榨，使临沂县一片荒凉。路上，逃难的人络绎不绝，地里，到处都有冻尸骨。不久，崇珍六岁的小弟弟就活活地饿死在母亲的怀里。弟弟临死的时候，还有气无力地喊着：“娘，我要吃煎饼，娘，我要吃煎饼……。”

第二年春天，苦日子更难熬了。崇珍听说青岛一些工厂又开工了，为了生活，他们娘儿几个不得不再去青岛。

崇珍娘儿几个走了，爹和奶奶在家里还是没法过啊！父亲才四十多岁就衰老得象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全花白了。他整天给地主扛活，由于劳累过度，不久便得了病，卧床不起。后来，又大口大口地吐血，不到半个月，就含恨离开了人间。父亲死后，崇珍的奶奶又想儿子又想孙子，哭得死去活来，整天在街上爬呀，哭呀，没有多长时间也死去了。奶奶临死的时候，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孩子，你在哪里？孩子，

你们在哪里？……”

孩子在哪里？这时她哪里知道她那些可怜的孙儿孙女，正在苦海里挣扎啊！

崇珍娘儿七个重来青岛，生活更艰难了。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青岛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鬼子、资本家相互勾结，贪婪地吸吮着工人的血汗，广大工人更陷入贫困和饥饿的境地。

一九三八年夏天，张崇珍又进了日本人开办的上海纱厂（现青岛国棉五厂），他本来是一个熟练的挡车工，却被分在细纱车间拉纱穗。在这座地狱里，中国工人不如日本鬼子的一只狗。他们可以随便拿工人取笑。一次，工人们排队领工资，一个小鬼子过来一把拽出一个工人，冷不防把他摔倒在地，疼得那个工人连爬几下都没有爬起来，鬼子在一旁却伸着小指头狂笑。另一个工人由于没被鬼子摔倒，鬼子竟用皮鞭把那个工人打得皮开肉绽。在这吃人的狼窝里，随时都会灾难临头。在一个又闷又热的夏天，崇珍从早一直干到晚，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劳累，加上又饥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刚想坐下来歇一歇，谁知屁股还没坐稳，就被一个比纱管还矮三分的鬼子领班看见了，“八格牙路，良心大大地坏了坏了的。”一边骂着，一边抡起皮鞭朝崇珍抽来。崇珍气极了，心想，反正

是干不成了，豁上去！他腾地跳起来，照着鬼子领班的胸口就是一拳，接着飞起一脚，把小鬼子踢倒在地，鬼子趴在地下哇哇直叫，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崇珍连夜跳墙逃出了虎口。

资本家不但随意欺压工人，还经常无故开除工人。崇珍的两个妹妹回青岛后，就在富士纱厂细纱车间干挡车工。进厂后的第八个月，崇珍二妹妹被分到靠门的车上。尽管她技术已经比较熟练，由于风大，营生还是很不好做。一天，乌云滚滚，狂风大作，尖厉的海风呼呼地往门缝里钻，纱线一根根被吹断，棉絮象雪花一样飞起来。崇珍二妹妹拚命地接头，仍然是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断头越来越多。偏偏在这时，日本领班和把头来了。

“纱！纱！我的纱！”象刺了他的心一样，日本领班饿狗般地嗥叫着，朝崇珍二妹妹扑来。崇珍二妹妹刚想躲避，却被把头抓住了，这只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抽出卷废花的竹条子，朝着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毒打后，又无理宣布开除崇珍二妹妹出厂。崇珍二妹妹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望着日本领班和把头那凶残的嘴脸，恨恨地骂这些洋奴，走狗！她把脚一跺，转身就走了。

就这样，从这个厂转到那个厂，尽管兄妹几个整

天拚命干，一家人还是忍饥挨饿。娘由于常常吃不上饭，饿出一身病，这时连野菜也不能挖了。每当崇珍回到家里，看见把小手含在嘴里望着他的小弟妹，看到苍老的母亲，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崇珍非常纳闷，穷人整天当牛做马，为什么却终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富人什么活都不做，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崇珍想，这下可有好日子过了。谁知虎去狼来，让人空喜欢了一场。国民党那些“接收大员”来青岛后，只顾巧取豪夺，敲诈勒索，那顾穷人死活，他们大批开除工人，崇珍也失业了。为了能找到一个糊口的地方，又不得不托人送礼，花了很多钱才进了华新纱厂（现青岛国棉九厂）。厂老板依仗着国民党的势力，对待工人十分苛刻、残酷，动辄就罚钱、开除。工人们整天拚命地干，一月的工资也只能买二、三十斤烂粮食。市面上物价飞涨，有时领到工资若不赶紧去买粮食，过一夜就会变成废纸。工人们实在干不下去了，有的故意把机器弄坏，停车怠工。为了笼络人心，老板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玉米面发给工人，说是玉米面，实际上是些连猪都不吃的饲料，里面净是沙子、头发渣。就是这样的东西，每人每月也不过发

三、四十斤。后来老板的布推销不掉了，他们又耍了个花招，给工人发布代替工资。工人每天织布三百多码，而发给工人的一月只有四十几码。资本家变着花样剥削工人简直残酷到了极点！张崇珍常常想：什么时候才是咱穷人的出头之日啊！

东方红，太阳升，阳光普照大地红。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青岛解放了！张崇珍，这个旧社会的奴隶，也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

解放后，张崇珍和广大工人一起，积极参加了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张崇珍学习了文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天，张崇珍怀着激动的心情站在鲜艳的党旗下，此时此刻，他有多少话要对毛主席说呵：想起那万恶的旧社会，有谁把他当人待？纺织工人真是纱线千尺恨万丈！今天，他不但在经济上翻了身，在政治上也翻了身。他激动地说：“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救了我一家，当了国家的主人。只要我张崇珍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拚命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二十多年来，张崇珍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他常说：“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打下了天下，使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不干，能对得起谁？”

张崇珍一家的生活也大变了样。过去受苦的五个弟妹，有四个入了党，当了国家干部；自己的五个孩子，都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已有四个参加了工作。现在是家里吃不愁、穿不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样样有。这位年近六十岁的老工人，每想到这些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他看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工作更积极了，决心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用这洁白的纱线，织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春天来。

纱厂艺徒话当年

——访青岛国棉九厂退休老工人

一九七六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山东师范学院的部分同学，来到国棉九厂，调查了解这个厂解放前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史。同学们在厂负责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厂房东南角的花园里，退休老工人张统文、李宗仁师傅被请了来。

“老师傅，你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请把你们过去受的苦给我们谈谈吧！”

沉默了片刻，张统文师傅两条眉毛聚成了个“一”字，他把攥紧的拳头朝凳子上用力一砸，气愤地说道：“过去的事，是得要说说。”从哪里谈起呢？老人凝视着厂房，又看了看面前这些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往日的辛酸，象开了闸的河水，一下子涌上心头。“咱先从资本家招工说起吧！”老人激动地说。

“在那一九二一年的秋天，老天象讨债的地主，整天阴沉着个脸。黄河下游地区一连下了十几天大

雨，河水一下子涨了上来。我家原是利津县宫家口村，紧靠着黄河大堤。当地的官府老爷和地主不知搜刮了堤旁穷人多少修河的捐税，钱财全部装进了他们的腰包，可河堤上从没见过添过一锹土。河堤年久失修，大水来了哪能担保不决口呢？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可怕的灾祸终于来临了。决了口的黄河水卷着浑浊的恶浪咆哮着，象饿极了的野兽，无情地吞噬着两岸的庄稼、房屋和百姓。洪水退后，田野上一片荒凉。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天一冷，穷人连树皮、野菜也吃不上了。

“灾民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青岛华新纱厂招工的来到俺庄，说要招收一批十二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去纱厂当艺徒。几个贼眉鼠眼的招工把头站在村头剥光了皮的大榆树下，指着招工的告示，装腔作势地高喊：‘乡亲们，这次艺徒进厂后，可以半天上学，半天干活，七天一休假；五年出徒，按技术定级，工资最少者每月三十元，学徒期间，管吃管穿……’说得唾沫星子乱飞。听了这一通‘漂亮话’，大家尽管都半信半疑，但为了找条活路，报名的人还是不少。那年，我刚十四岁，我三哥十七岁，我们两人也一块报了名。

“离家的前一天，正是仲秋节。晚上，地主家猜拳行令，喝酒赏月；我和三哥却陪着母亲在破草棚里哭了半夜。第二天，要上路了，娘把家中仅有的两块野菜饽饽塞在我兜里，拉着我和哥哥的手，千叮咛、万嘱咐。送行的乡亲们挤满了村口，到处是一片哭声。来领人的厂警连推带拉，押着我们庄五十多名小弟兄上了路。走了老远，我回头一看，爹背过身去，在用手擦眼睛；娘站在村口，张着嘴，似乎还在叮嘱什么。但是，已被一片哭声淹没了。我扯着哥哥的衣襟问道：‘哥，你说咱啥时能回来看望爹娘啊！’哥哥用手擦去我脸上的泪珠，安慰我说：‘啥时回来都行。’说完自己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在路上，稍不顺招工把头 and 厂警的心意，不是打，就是骂。走着走着，我的鞋被踩掉了，刚弯下腰去提鞋，一个厂警朝我背上就是一鞭子。哥哥一看，急忙去拉我，‘叭’一鞭子又抽到他的胳膊上。我气愤地说：‘你凭什么打人！’‘妈的，老子就凭这个！’厂警骂着，晃了晃手中的鞭子，又朝前面的弟兄们身上抽去。

“哥哥胸脯一挺：‘走！这徒工咱不当了。’

“一个骑马的家伙从后面赶上来，把路一拦，喝道：‘到哪里去？’

“‘俺回家。’我说。

“‘穷小子，回家由得你吗？老老实实跟我走！’骑马的警官挥舞着鞭子，把我们哥俩又赶进了人群里。

“厂警和招工把头就这样象赶牲口一样，把我们押进了工厂。”

听到这些，同学们无比气愤。大家都注视着张师傅，听他继续讲下去。

“进厂后，把头逼着我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换上厂里做的号衣。”

“号衣？”小高诧异地问了一声。

张师傅用手比划着说：“这号衣，资本家说是洋布新衣，其实是骗人的玩意儿。它是用染成灰色的包花布做的，里面夹了薄薄一层车肚花。这种衣服没有领子，上下身连在一起，上衣的袖子上镶着三道蓝杠，右肩膀头上用油漆写着号码，活象花蛇皮。后来才知道，这是资本家为防备艺徒逃跑，特意做的。这种衣服大家都不愿意穿。一个弟兄只说了句：‘这样的衣服俺不穿！’就被一个外号叫‘宋阎王’的把头拉到管理室，打了一顿，硬逼着换上号衣。”说到宋阎王，张师傅象想起了什么，指了指李师傅说：“李大哥进厂第一天就被宋阎王毒打了一顿。”

同学们的目光转向李师傅，只见他宽阔的前额上，一道道刀刻般的皱纹显得很深，眉宇间透出一股宁折不弯的骨气。他亮开纺织工人独特的嗓门，激愤地说：“我是和张师傅一块进的厂。第一天开饭时，每人发了两个糙米饼子，老远就能闻出一股难闻的霉味。往嘴里一放，沙子直硌牙，里面麻袋毛、头发渣子什么都有，实在咽不下去。可是肚子饿，顾不得弄好，三口两口就把两个饼子吃完了。末了，大伙还嚷着没吃饱。你们想想，饿了一天多，两个饼子怎么够呢？大伙一嚷嚷，宋阎王听见了，他打着饱嗝，大摇大摆地从管理室里走了出来。他把三角眼一吊，问道：‘都是谁没吃饱？’我瞪了宋阎王一眼，心想，就是你这个老贼把俺骗来的，没吃饱还不让说？！我往前一站，说：‘我没吃饱！’随着我的话音，又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徒工站出来。接着大家一起嚷了起来。宋阎王嘿嘿一阵冷笑：‘好吧，这一次管你们个饱。’他把我们几个领头的带到管理室，四五个把头如饿狼般地涌上来，将我们按倒就打。他们边打边问：‘吃饱了没有？吃饱了没有？’最后硬逼着我们说吃饱了才算罢休。”

“同学们，你们看！”李师傅说着解开上衣，用手指着胸脯上的一道道伤痕，愤怒地说：“因为一句

话，他们就抽了我四十鞭子啊！”

看到李师傅身上的伤痕，同学们个个怒火满腔。

李师傅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伤还没好，把头就催逼着上了工。在上下班的路上，厂警端着枪，象押犯人似地监视着我们。车间里，机器吼叫，震得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俺这些乡下来的孩子都是第一次进工厂，看见机器象见了怪物似的，吓得呆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几个年龄小的还用手掩上耳朵。把头从后面赶来，一步一鞭，逼着我们往里挪动。车间里又闷又热，纷纷扬扬的棉花毛一个劲儿地往鼻孔、嗓子眼里钻。在里面呆不大一会，全身就成了个棉花蛋。

“进了车间，我们年龄稍大点的被派去摇纱。本来摇纱机可以用电带动，因为当时电贵，资本家为了多赚钱，宁肯累死工人也不用电。大家只好光着膀子拚上命地摇。摇上一天，浑身就象散了架一样。不几天，我们的手、胳膊都肿起来了，真想歇一会儿。刚放下摇把，把头的鞭子就抽到了身上，我们只好忍着疼再干。这样干了半个多月，资本家看我们基本上能够独立操作了，就又生了新法，硬规定我们每人每天摇三十多车纱。摇不够的，轻的挨打，重的罚干连班。还规定我们在车间里，不准讲话，不准随便走动，吃饭不准停车……工人吃饭时，只得将窝窝头放在机器

上，摇上两圈咬一口，一边干，一边吃。一个窝窝头还没吃几口，便落上一层尘土、花毛，再吃就得先剥花毛。

“资本家豢养的把头 and 领班，整天在车间里转来转去，硬是鸡蛋里挑骨头，专找工人的事。一次，宋阎王硬说我摇的纱断头多。我不服，心想，你们为了多赚钱，里边掺上一些次花，能不断头吗？还没等我分辩，宋阎王手中的竹板就落到我身上。接着，他又说我摇的纱不够数，把竹板蘸上水，又打了我五板子。嘴里还骂道：‘妈的，这一次轻饶了你，以后再发现你摇得不够数，少一根纱就打你两板子！’骂完，扬长而去。我盯着他的背影，用手抚摸着火辣辣的皮肉，骂了一声：‘走狗，等着吧，总有算账的一天！’

“在打骂中熬过了一个多月，我们都扳着指头数着几时能发工钱。纱厂老板‘周大肚子’，借发工钱又想出了坏点子。厂里专门印了一种‘华新票’发给艺徒做工钱。这种‘华新票’，只能在厂里开的一个小铺里使用。小铺里卖的东西价格又比外边贵好几倍。就是这种‘华新票’我们工人拚死拚活干一个月，每人只发给三角钱。在发给我时，狠毒的宋阎王借口说我带头闹事，从中又扣去了一角。当时，恨得我真想

上前咬他几口。我噙着眼泪，看了看磨破了的双脚，想买双鞋子穿。走到小铺前，把两角钱递给了掌柜的。我说：‘掌柜的，给我拿双鞋吧！’掌柜的一听说是买鞋，就把钱扔出来了，说：‘拿两角钱还想买鞋，连半只也买不到。’当时气得我浑身发抖，拾起两角‘华新票’就撕成了碎片。

“正在这时，听有人惊呼：‘前纺车间出事了！’我刚要跑去，被一个把头用鞭子拦住了。下班后，前纺车间的一个弟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在他车间里，有个叫吕加林的艺徒，上茅房时因没请假，把头就说他偷懒，他分辩了一句，把头上去就是一阵毒打，打完又被罚干连班。吕加林汤水没进，又累又饿，干着干着，实在支撑不住，身子一歪，撞到了皮带上。飞转的皮带一下子把吕加林卷了进去。等到旁边的艺徒赶来关了车，可怜的吕加林已被皮带扯得四分五裂了。天花板上溅上好多鲜血和脑浆，皮带上、天轴上粘着一块块皮、一块块肉……”

李师傅说到这里，嘴角痛苦地抽动着，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了下来。

张师傅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接着说：“旧社会真是吃人的社会啊！进厂前，我曾想，进了工厂，就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了，兴许生活能好些，进厂后我才

知道，地主和资本家是黑碗、蒜臼子——一个窑里的货，都是穷人的死对头。刚才李大哥讲的那些悲惨的事，我们当艺徒时哪一天不遭遇几件啊！

“资本家榨取了我们工人的血汗，盖起了一座座厂房。工人却住着二十多幢又矮又小的房子，门上还编上号码，窗户上安着一根根铁棍子，资本家叫它‘号房’，实际上是监狱。我们六十多个小弟兄挤在一间号房里。冬天，屋里象冰窟，每人只给一条用包花布和车肚花做成的小被子。个子稍高一点的，连脚都盖不住。到了夏天更遭罪，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地下老是湿漉漉的，一进屋，蚊子直往脸上扑，往铺上一躺，臭虫就满身爬。资本家还给每幢号房派了一名看号司。看号司恐怕我们夜间逃跑，在屋里放上两个大罐子，把门一锁，大小便都不让出屋。闷热，潮湿，加上蚊子、跳蚤叮咬，每个人身上都生了疥疮。疥疮被抓破后，血、脓和汗水流在一起，号衣紧紧粘在皮肉上，晚上脱衣服时象揭皮似的痛。我们在这人间地狱里就这样熬了一年。记得一天晚上，一道月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我自言自语道：‘好亮的月光！’三哥在一旁答道：‘今天是中秋节。’三哥的话蓦地使我想起了一年前离家的情形。我走到窗口，向着家乡的方向望着，想起了忍饥受饿的爹，想起了

病在床上的娘……

“‘哥哥，咱娘她……’我难过得说不出话，眼泪噗簌簌地直往下掉。其他弟兄听到我们哥俩的对话，也都想起了自己的亲人，号房里传出一片哭声。”

张师傅难过地停了一会，又说：“资本家对我们艺徒的剥削就象木管让棉纱缠住一样，越缠越紧，越缠越重。时间一长，我们的身体都变了形，两只胳膊向里合着，生病的也越来越多。这时，资本家又想出一个坏主意。他假仁假义地找来一个跑江湖的野大夫，弄了间房子，算是给我们艺徒立了‘医院’。这个野大夫姓潘，根本不懂医术，可是对待艺徒却比蝎子还毒。一次，一个叫黄延福的弟兄发高烧，吃了潘蝎子的药，时间不长就活活给药死了。从那以后，我们宁肯病死也不愿去找潘蝎子。资本家却抓住把柄，说：‘有病不找大夫看，那就不是真病。’许多病得很重的小弟兄也只得支撑着身子去上班。一个叫尹之清的弟兄得了痢疾，就是这样被逼着上了班。老工人看他病得可怜，偷偷地送些药和独头蒜给他治病。上班后，他口渴得厉害，想找口水喝，可又不敢放下手里的摇把。一个老工人见了接过摇把，递给他一个碗，说：‘小尹，不要怕，把头来了有我顶着，你找碗水喝吧。’尹之清激动地接过碗，摇晃着身子去找

水，发现煮机件的锅里有开水。小尹实在是渴极了，也顾不得脏，吃力地沿着水锅的台阶往上爬，爬到台阶顶上时，已累得喘不上气来。锅里沸腾的水突突地往外冒热气，上面漂着一层厚厚的油污。尹之清喘了口气，急忙探着身子去舀水，踏在台阶上的腿直颤抖。他拂了拂水面上的油花，手一滑，碗掉在了锅里。他一急，往前一探身子想去捞碗，头被热气蒸得昏沉沉的，哪里还有力气控制自己，只听‘噗通’一声，尹之清一头栽倒在开水锅里。旁边的工人发现后，赶忙把他拉了出来。尹之清连滚带爬地跌下台阶，他疼得发了疯，边哭边往下撕号衣，每一片号衣上都粘着一层烫熟的肉皮。他一面凄厉地叫喊着，一面挣扎、翻滚着，爬了没几步，便一头栽倒在车间门口……

“尹之清就这样被活活地烫死了！”

张师傅悲愤交加，过了一会儿，又沉痛地说：“就在尹之清死去的第二天，俺三哥又病死在车间。狠毒的资本家夺去了我们多少阶级兄弟的性命啊！纺织工啊，纺织工，纺不完俺艺徒的仇，也织不尽俺艺徒的恨！”

血泪的控诉，绞着同学们的心。阶级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着。

这时，李师傅颤抖着站起来，愤愤地骂道：“资

本家叫金钱熏黑了心，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干得出来！和我同村的刘士和弟兄病重躺在屋里，我们下班后，发现他不在了。我急忙跑出去问看号司，看号司只冷冷回答了三个字：‘休养间’。一听送到‘休养间’，我的头‘轰’的一声，预感到事情不好。‘休养间’就在艺徒‘医院’旁边，说是资本家给重病的艺徒们‘休养’的地方，其实是一间等死房。因为艺徒的活这么重，条件这么恶劣，很多得了肺结核等传染病，死去的不少。资本家怕传染的人多了，没人给他干活，才想出这么个办法，看谁快不行了，就叫谁进去‘休养’。我不顾看号司的阻拦，冲进‘休养间’，立刻，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躺在木板上的三十多个弟兄，有的昏迷不醒，有的在哭泣、呻吟。躺在门口的一个小弟兄，脸色蜡黄，吐一口血，叫一声娘，直骂狠心的资本家。看到这惨状，我赶忙找了一块破布帮他擦了擦嘴上的血。我又挨个看看，在最后面发现了刘士和。只见他深陷在眼窝里的一双眼睛紧闭着，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我喊醒了他，问他吃饭了没有？他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用眼瞥了一下放在枕头上的碗，嘴张了几张，没说出话来。我拿起碗，走到门口，往一个给病人盛饭用的大木桶里一看，里面有几块窝窝头，几根老菠菜梗子，一股怒火窜上胸口，心

想，这哪是病人吃的饭！我立即跑到外边找了一碗凉水端到小刘面前，他眼里噙着泪水，吃力地伸出手朝我们家乡的方向指了指，便又昏过去了。

“‘小刘，小刘！’我抓着他的手，大声叫着。

“‘谁在里面叫魂啊！’门一响，厂警和看号司抬着一个用破木板钉的棺材走了进来。厂警看我在屋里，上前把我推了个趔趄，骂道：‘你小子偷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气愤地指了指躺在木板上的刘士和说：‘人病得这样厉害，你们怎么不给看？’一个看号司哼了一声，阴险地说：‘这回保管叫他好个利索。’说完，把我赶出了‘休养间’。

“我绕到房子后面，扳着窗上的铁棍子朝屋里一看，只见这几个畜牲架起刘士和就往棺材里扔，小刘挣扎着把手伸到了棺材外边。一个看号司把他的胳膊往里一推，恶狠狠地举起斧头钉上了棺材。看到这里，我的头发竖了起来，大声地喊着：‘人没死，你们怎么就……’没等我喊出第二句话，宋阎王闻声赶来，从背后扯着我的衣服，一下子把我摔倒在地。我爬起来，朝抬棺材的厂警、看号司奔去。宋阎王又一脚把我踢倒，抹着腰说：‘他死不死关你小子什么事？’我再次从地上爬起来，强压的怒火再也憋不住了，心想，豁上命和这狗杂种拚了！使用力朝宋阎王撞去。



宋阎王没防备，被我撞了个仰面朝天，我顺手抓起半截砖头朝他砸去。这时，一群厂警、看号司跑了过来，围住我，用皮鞭、枪托朝我劈头盖脸地打来。宋阎王一面拚命地打我，一面恶狠狠地骂道：“兔崽子，你要声张出去，刘士和的路在等着你。”

李师傅说到这里，气得胡须都抖动起来，他转身用手指着花园大声说：“同学们，这里就是当年艺徒的坟地。不到三年时间，就有三百九十多名弟兄被资本家埋在了这里。”

同学们顺着李师傅的手望去，仿佛看到了花园下面艺徒的白骨，看到资本家的银洋、元宝、金条上面沾满了艺徒的汗水、泪水、鲜血。

小高扶着李师傅，请他坐下，忿忿不平地说：“资本家和封建把头这么狠，你们应该团结起来和他们斗啊！”

张师傅卷好手中的烟，“嚓”的一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说：“对！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进厂后，我们没少和资本家斗。开始是磨洋工、砸木管、毁坏机器。可是，砸碎一根木管，资本家用剥削我们的钱可以再买十根，而且被把头发现后，不是罚钱，就是打个半死。以后，有些弟兄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偷偷地换掉号衣，逃出了虎口。资本家

察觉后，开除了几个帮助艺徒逃跑的老工人，对我们艺徒的戒备也更严了。但这并没有动摇大家逃跑的决心。一天，摇纱车间的四十多名弟兄，趁着夜里下大雨的机会，在下班的路上，推倒厂警，跑了出去。这下资本家火了，派出厂警，四处搜索，抓回了两名小弟兄，当着全体艺徒的面，把他们吊在树上毒打了一顿。两名弟兄被打后不几天，就相继含恨死去了。从此资本家看管得越来越严，惨遭迫害的工人也越来越多。

“我们艺徒整天过着暗无天日、人间地狱的生活，我们日日想，夜夜盼，盼望着有人来搭救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叫李德根的工人经常和几个年龄较大的艺徒背地里交谈。记得有一次痛打宋阎王，就是由李大哥他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弟兄具体布置的。让李大哥给你们谈吧。”

“好！我再谈谈。”李师傅说：“宋阎王在厂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李德根叫我们设法教训一下宋阎王。”

“我们事先串通好了，几个车间全部停了车，每个人都预备了铁棍、木管。不大一会儿，宋阎王听不见车响，便提着鞭子来到车间，把驴脸一沉，骂道：‘是哪个小子让停的车？嗯，想找死吗？’”

“看到他那副可憎的面孔，我想起了尹之清、刘士和等弟兄们的死，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我举起铁棍，高喊了一声：‘打！’趁着灯不明亮，几十个弟兄从车挡里跑出来，奔向宋阎王。老工人也都呐喊着为我们助威。宋阎王一看，掉头就往外窜。一边跑、一边扯起驴嗓子狂叫着：‘来人啊！穷小子要造反啦！’他只顾跑，一脚踩在木管上，‘噗通’一声，狗抢屎似地摔在地上，我跑上前去，骂了声：‘宋阎王，让你小子也尝尝棍子的滋味！’照着他的腰就是一棍子。大家喊着‘打死他！打死这条走狗！’一顿棍棒，打得宋阎王翻瞪着白眼，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十几个厂警闻声跑进车间，把打得半死的宋阎王抬走了。”

艺徒们当年斗争的场面，感染了每个同学。小刘兴奋地站起来说：“打得好！真是罪有应得！”小高擦掉挂在腮边的泪珠，随着拉了小刘一把，说：“别嚷嚷，听师傅继续讲。”

李师傅挺了挺胸膛，象置身于当年火热的斗争中一样，又兴致勃勃地讲下去：“怒打宋阎王以后，资本家开始感觉到，这帮‘小花毛虫子’不象刚进厂的时候那样，任他欺骗、任他摆布了。从此厂警、把头对艺徒也就不得不收敛一下，特别是宋阎王，再进车间时，总是让两个二把头跟在后边。通过这次斗争，使我

们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大家团结得更紧了，以后，又跟着老工人学会了不少斗争的方法。

“一九二六年四月，钟渊纱厂等几个日本资本家开办的纱厂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保障人权。我们华新纱厂的工人也举行罢工声援他们，同时提出废除艺徒制和其它一些条件。罢工运动吓坏了中外纱厂的资本家，华新厂的老板‘周大肚子’也不得不答应工人的某些条件，废除了艺徒制。”

听到这里，同学们嘘了一口气。小刘往前探了探身子，问道：“资本家屈服了？”

李师傅站起来，继续说道：“屈服？那些狼心狗肺的资本家，本性是不会改的！从那以后，资本家又变换了花样来欺压我们，我们工人团结起来，打击它一下，它表面上老实一些，作点让步，实际上是以此来安抚我们，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榨取我们更大的油水。”

李师傅打算继续讲下去，同学们也都想再听听，然而厂里来请两位老师傅去参加大批判会，同学们只好告辞。临走，老师傅热情地说：“以后你们一定再来，咱们再说说新社会的事！”

纺织工人斗争片断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纺织工人和其他工人一样，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异常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只要工人身上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这些吸血鬼就决不肯罢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广大纺织工人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解放，运用各种形式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下面是青岛国棉一厂（原大康纱厂）、国棉六厂（原钟渊纱厂）、国棉九厂（原华新纱厂）工人与中外资本家、封建把头及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几个片断。

智 愆 西 林

这件事发生在钟渊纱厂。

钟渊纱厂，是解放前日本资本家在青岛开办的八大纱厂之一。日本资本家为了强迫中国工人为他们卖命，除了制定种种残酷剥夺工人人身自由的厂规外，还豢养了大批走狗当把头，分布在各个车间监视工人。这些把头无恶不作，对待工人凶狠毒辣，工人对他们真是恨之入骨。

钟渊纱厂有一个发电所，这个发电所供应着全厂用电。只要发电所一停电，全厂的机器就甭想转动。因此，工人们罢工总是先从发电所开始。日本资本家也最怕这一手，为了严密控制发电所的工人，就派了一个叫西林的日本把头，到这里来当监工。

满脸横肉的西林长得又胖又矮，装着一肚子坏心眼，时时在生着鬼点子欺压工人。西林来发电所后，干的坏事真不少。

发电所的工人，每天在高温中干活，一天十几个小时干下来，人人身上都是汗水和着煤灰，鼻孔里也被煤灰塞得满满的，工人们只好在下班前，瞅空到厂西边的海池里去洗一洗、冲一冲。西林发现后，就悄悄地溜到海边把工人的衣服偷回来，然后把后门关死。这样工人就无法回来拿上班的折子，一天的汗水就白淌了。

冬天工棚里冷得象冰窖。工人们没有被盖，又加

上吃不饱，一到晚上又饥又寒无法睡觉。有的工人就弄些干草，找来几块破麻袋片，铺在小锅炉的沟底里，好歹躺在上面闭闭眼，打个盹。这本来不碍西林啥事，这小子却不让，但又不出来制止，等工人们都躺下了，他就在半夜里，偷偷地向沟底里放水，或者打开小锅炉的气管，突然放出一股热气，害得工人休息不成。

干活时，工人们停下来擦擦汗、喝口水，西林就认为是偷懒，过来伸手就打、抬脚就踢。工人知道西林个矮、腿短跑不快，不等他伸手抬脚就躲开了。西林就做了一个弹弓，又团了一些泥球，看见哪个工人不顺眼，就偷偷地站在远处打弹弓。工人们为了提防西林这一手，要喝水抽烟就躲到锅炉房的墙根底下，让西林看不到，即使看见了，他那个弹弓也用不上。时间长了，西林这条毒蛇又想了个鬼点子，只要一看见锅炉墙头顶上，升起缕缕烟雾，就知道，不是有工人在抽烟，就是又有人在喝水，于是他就向墙根底下扔石头、瓦片，多次把工人砸得头破血流。

西林作恶越多，工人对他就越恨。工人们早就想给他点厉害看看，这天西林又打伤了工人，大家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一个姓孙的工友和几个工人合计了一下，就分头准备去了。

工人们故意把锅炉的水管弄坏，让它漏汽。又叫一个工人去报告总管松本，说锅炉出了毛病，让他亲自去看看。

这时锅炉墙顶上又升起了缕缕雾气，西林想准又有人在抽烟、喝水。便随手拣起两块大砖头，咬咬牙使劲扔过去，可是往上冒的烟雾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了。西林火了，把弹弓往口袋里一塞，象螃蟹一样沿着早已搭好的木板往锅炉顶上爬，想爬到上面去看看，到底谁在抽烟。那知，西林刚爬上锅炉顶没走几步，就一脚踏上了工人布置的“机关”，只听“哎哟”一声，西林一下掉进了锅炉里。

周围的工人停下手里的活，装着要去救。这时总管松本正好走进锅炉房，还以为是工人掉进了锅炉里，就大声吆喝“快干活！”工人们一听正好，就干起活来。当松本知道是西林掉进锅炉里时，急得团团转，连忙要工人去救，待把西林从锅炉里拖出来，西林早在开水里煮熟了，变成了一堆烂肉泥。

西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工人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孙工友对大伙挤了挤眼说：“这回是西林‘自己’掉下去的，想不到咱锅炉里煮出‘红烧肉’来了！”

“茅房里的秘密”

钟渊纱厂的日本资本家，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原料生产棉纱，榨取高额利润。他们这种掠夺行为，激起了工人的满腔怒火，工人们采取怠工，破坏机器，出废品布等办法来对付资本家。有时车间里马达隆隆响，其实开的是空车。工人们在一旁打瞌睡，望风的工人远远望见把头来了，就发一个信号，大家立刻装着很卖力的样子干起来，把头一走，又是空车在隆隆地转，有的干脆把车关了。

日本资本家眼看着产量一天不如一天，次布一天多于一天，却毫无办法。然而最使日本资本家恼火的，还是“茅房里的秘密”。

钟渊纱厂刚开工时，茅房是由厂里雇人打扫，粪便由打扫茅房的人出卖。可是到了后来，挖茅房的人，有的即使厂里不给补钱，也自愿担当挖茅房的“义务”工；有的干脆自己掏钱，把厂里的茅房包下来。再到后来，争着挖茅房的人越来越多，包挖茅房的价钱也就越来越高。日本资本家在工人骨头里也想榨出点油来，对这项赚钱的买卖焉能不动心！鬼子总管松本，咧着大嘴高兴地说：“别看几个穷工人，可

浑身是油哩，光粪便卖的钱，就差不多够他们的伙食钱了。”

有一天早晨，挖茅房的粪车刚要出厂门，恰巧松本从旁边经过，当他发现粪车后边有一个用褂子包着的小包时，感到很奇怪，就捂着鼻子，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把小包一挑一抖，想不到沾满大粪汤的线穗子撒了一地。原来这一天包主在茅房里挖的线穗子太多了，粪桶里边装不下，这个包主又脱下小褂包了一包。事情就从这里露馅了。松本连忙喊来了几个把头，揭开粪车上的粪桶盖一看，里边也是线穗子，这时松本气得直跺脚，又象明白了什么似地自言自语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包主们出那么大的价来包挖茅房。”

那些白生生的线穗子，怎么会跑到大粪汤里去了呢？很清楚，这是工人们丢进去的，这在当时，也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对资本家斗争的一种手段。

压不住的怒火

一九三〇年前后，中国资本家开设的华新纱厂，在八个日资纱厂的联合竞争下，不断发生危机。资本家想把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就制定了一个减少工

资、大批解雇工人的方案。这个方案还没实行，工人已经知道了。老阎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决定发动群众，粉碎资本家解雇工人、减少工资的阴谋。

一天，经理吴伯生宣布开除三个摇纱工人。老阎他们知道，这是资本家下手了，今天开除这三个工人，明天还不知哪些工人又要遭殃。于是按商量好的办法，在摇纱车间关了车。把头们一看机器停了，都急忙奔向经理办公室去报告。

吴伯生一听工人关了车，把桌子一拍说：“混蛋！简直要造反！”又看看被吓得战战兢兢的把头，说：“怎么叫工人吓成这个样子，真是些熊包，走，跟我去看看去！”几个把头只好硬着头皮“陪”吴伯生来到车间。

吴伯生摆出一副堂堂经理的架势，挺着大肚子走进车间，本以为工人们看见他就一定会乖乖地去开车，没想到工人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个个满脸怒气地看着他。吴伯生这才感到事情不妙。可是这家伙十分奸诈狡猾，立刻见风转舵，把那副气势汹汹的面孔换成了一副笑脸，接着爬上车间过磅记数用的一张桌子，“吭吭”地咳嗽了两声，慢条斯理地说：

“诸位有事可与吴某面商，何必关车？……”没等他再往下说，工人们就喊开了：“为什么解雇工人？！”

“为什么开除他们?!”

这时，其他车间的工人也都关了车，挤到粗纱车间里来了。吴伯生慌忙摆了摆手，抬高嗓门说：“大家不要吵，关于这个问题，厂方有权决定，鄙人……”没等吴伯生继续狡辩，一个姓曲的小伙子，朝吴伯生站的桌子狠狠蹬了一脚，说：“你有权开除工人，我们就有权关车！”工人们也高喊：“不把开除工人的布告收回去，别想开车！”

吴伯生差点从桌子上栽下来，等他站稳脚跟后，脸一变，刹时露出一副凶狠相。他左手把腰一抹，右手朝工人们一挥：“你们想造反吗？我只要挂一个电话，你们就得进衙门蹲冷屋子，不信，你们试试……”正在他凶神般吼叫的时候，忽然从远处飞来一个木纱管，“咚”的一声正打在他溜光的脑壳上。工人们一阵哄堂大笑。他用手捂着脑袋骂了一句“混蛋！”接着把贼眼一瞪，黄牙一呲：“你们想干什么！当心你们的饭碗！”

他想用“开除”来吓唬工人，可谁听他那一套！整个车间马上变成了战场，到处都是“打！打！”的喊声。飞蝗似的木管朝着吴伯生“嗖嗖”地飞去，落在他那光秃秃的脑壳上，象敲小鼓似的。吴伯生这才感到大难临头了，想叫把头们来解救他，可是回头一

看，几个把头早溜得没影了。他觉得浑身一阵酸软，便一屁股坐在桌子上，示威似地嘶叫起来：“你们打死我吧！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办？”工人们哪管他嘶叫，边扔边喊：“打死就打死！”“打！”

这时，一个小伙子搬来了一个盛有木管的大竹筐，跑到吴伯生的后面，照着他的头“哗”地一声，稳稳当当地就扣上了。木管顺着他的头“劈劈啪啪”往下掉，吴伯生一面象野猪般地嚎叫，一面用手取筐子，等他取下筐子，那颗滚圆铮亮的脑袋，东一个疙瘩，西一道口子，好象个烂西瓜。这下子吴伯生平日的威风早没了。他一翻身，滚下桌子，从地下爬起来，双手抱着头，象老鼠似的夺路而逃。

老阎大喊一声：“走！找老板算账去！”

平时，资本家在工人面前耀武扬威，今天，工人一齐心，资本家就熊了。周老板见吴伯生被打，自己的办公室又被工人围得水泄不通，急得不停地用手绢擦汗。工人们齐声喊：“不准解雇工人！”“不准减少工资！”周老板看到来势凶猛，只得硬着头皮，走出办公室，无可奈何地说：“好说，好说……”

一个青年工人一把把贴在墙上的那张开除工人的布告撕了个粉碎。

工人胜利了，那套解雇工人、减少工资的方案再

也没有敢提的了。

纺织女工痛打鬼子

一九四四年，全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区的各个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尽管日本鬼子统治很严，消息封锁得很紧，但是通过地下党的活动，工人们私下里知道很多，受到极大鼓舞。华新纱厂（青岛沦陷后被日本资本家霸占）的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日本鬼子、封建把头的斗争也越来越活跃。

那时，织布车间有一个叫中村的鬼子把头，长得又粗又矮，两只眼细得就象用小刀割出的两条缝，鼻梁上架着一副一圈套一圈的近视眼镜，看东西得凑到鼻子尖上，因此工人姐妹都叫他“瞎子”。

中村这家伙眼睛不好，心眼更坏。特别爱找女工的岔儿，常常无故打骂，任意欺凌。一次，“瞎子”查出一个女工漏验了一块次布，没问青红皂白，摸起一把剪子照着这个女工头上就戳。谁要上厕所的时间长一点，中村就说是磨洋工、偷懒，不是打，就是骂。有一天，织布女工李秀兰肚子痛得实在支持不住，上

厕所时，在厕所门外的一个水池边上趴了趴，中村溜过去，冷不防照着李秀兰就是一脚，痛得李秀兰半天没直起腰来……

女工们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早就想要狠狠地收拾中村这个坏家伙。

这天，李秀兰和几个姐妹，故意成群结队地从中村面前经过，上了厕所。

厂里的厕所由于无人管理，粪便堆得老高，地下尿流满地。工人们只好找来一些砖头，隔一步远的地方垫上一块，上厕所得踩着砖，要不就没处落脚。夏天里边苍蝇嗡嗡乱飞，一落就是一大片，地下、墙上到处爬满了蛆，有时墙上的蛆多了，就一层一层往下翻。

中村看见几个女工上了厕所，就又悄悄地跟在后面，和往常一样，蹲在厕所外面计算着时间，等着女工们出来。

可是等了一会儿，女工们一个也没出来，中村就沉不住气了，想到厕所里去把女工们赶出来，中村推开门，厕所里黑乎乎的，两只小眼睛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他又害怕脏了他的两只脚，只好用力瞪大眼低头寻地下的砖块，找个落脚的地方。这时躲在门后的王大姐，向李秀兰使了个眼色，趁中村还没有落脚的

时候，猛地把中村一推。中村一个趔趄跌倒，来了个“狗吃屎”。还没等中村喊出声来，姐妹们一齐扑上去，有的用拳头捶，有的用脚踢。王大姐双手按着他的头，使劲往尿里按，中村想喊一声都喊不出来。中村趴在尿汤里，眼镜子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姐妹们边打边骂：“‘死瞎子’叫你再朝着我们发横！”“今天非打死你不可！”秀兰她们打够了，把中村往尿里按了按，就跑出来了。她们把厕所的门反扣上，进了车间若无其事地干起活来。

过了好一会儿，中村才把厕所的门弄开，象个“黑瞎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身上的尿顺着他那呢子服往下滴，脊梁上还有不少长尾巴蛆，周围的苍蝇围着他嗡嗡地叫。不知他怎样摸到的眼镜，已经碰破了一片，另一片上糊满了尿水。几个青年故意嘲弄他说：“哎哟，中村先生洗澡走错地方啦！”中村有口难言，只好一步一拖，一步一个湿脚印地走回去。

李秀兰几个姐妹，心里真是痛快极了。

团结起来赶把头

夜，已经很深了。在大康纱厂低矮的工人窝棚里，人们围着油灯，七嘴八舌在骂周立春。

周立春是粗纱乙班的大把头。这家伙很早就投靠了日本鬼子，先在大康纱厂当小把头。由于他对工人心狠手辣，又善于阿谀奉承，所以很得日本资本家的赏识，不久便当了大把头。从此以后，他更贴紧了日本鬼子，象哈巴狗一样，天天跟着鬼子的屁股后头转，死心塌地地为其主子卖命。工人上夜班时，他就偷偷地爬到天窗外边，瞪着两只贼眼监视工人。倘若哪个工人干活慢了，或者打盹，他就拿起粗纱木管，照着工人的头朝下打，经常把工人打伤。

更气人的是，这家伙还经常到工人中偷听消息，然后去报告日本鬼子，回来就威胁工人们：“今后不准你们再听共产党的宣传，不准闹事，谁跟共产党闹事就开除谁！”为这些事，工人们暗地里曾狠狠地教训过他。当时周立春叫工人们揍得趴在地上给大伙直磕头，说：“以后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可是近来，这家伙又嚣张起来，变本加厉地欺压工人。所以大伙商量怎么整治他。大家出了些点子，最后有个师傅说：“打一顿不管用，这回得想个法子，用我们大家的力量，迫使资本家把他赶走……”

第二天上午，粗纱车间的工人全部关了车。周立春走进车间，看见工人们都站着不动，感觉到事情不妙，就急忙跑出去报告日本总管。一会儿，周立春跟

在日本总管的屁股后面，来到车间声嘶力竭地威逼工人开车，可是不管周立春怎样叫喊，工人还是站着不动。

周立春只好又跑到厂部，把其他几个鬼子头目都请了来。鬼子头目们一看工人罢工了，心急如焚。可是，他们也知道，工人齐了心就不好对付，于是便换了一副嘴脸对工人们说：“大家有话好说，还是先开车……”工人没等资本家说完就齐声嚷嚷：“周立春打骂工人，我们要求开除他！”“周立春不滚，我们就不开车！”“周立春在这个厂我们没法干……”

周立春为鬼子卖了不少力，他们怎能舍得撵走这条狗，但是不叫他走又怎么办呢？鬼子深知众怒难犯，闹大了引起全厂罢工，那损失可就大了。鬼子权衡利弊，只得丢卒保厂，接受工人的要求，答应开除周立春。

周立春终于被赶走了。斗争取得了胜利，它鼓舞着人们去迎接新的斗争。

黎明前的战斗

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着青岛。



天快亮了，青岛快要解放了，但黎明前的黑暗，意味着还要经历一场艰苦的战斗。

龟缩在青岛市的国民党反动派，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们妄图破坏工厂，毁坏机器，阻挠厂矿回到人民手中。中纺一厂（抗战胜利前的大康纱厂）就是他们妄图重点破坏的单位之一。

中纺一厂，有几万纱锭，几千台织布机，还有全市极为重要的发电设备。国民党反动派曾叫嚣，要把中纺一厂变成一片灰烬。但是这个厂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抢先发动了工人群众，成立了工人护厂大队。

护厂大队的总指挥，是地下党员老朱同志。他们定了联络暗号、通讯口令，分析了敌人可能采取的破坏手段，发动广大工人研究了对策，全厂布置了六十多处暗哨，发电所等要害部门由护厂队员手持棍棒巡逻；南北厂门和车间的要道、门窗，都被工人用沙袋堵死了，墙上通上了电网。厂里的几个反动头目，被工人们严密看管了起来。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还通过护厂大队开展政治宣传活动，揭露蒋匪破坏工厂的阴谋，戳穿各种反动谣言，稳定群众思想，并提出了保卫工厂，与工厂共存亡的战斗口号。

为了防止敌人毁掉或运走布匹，地下党组织决定

将仓库里的所有布匹疏散隐蔽起来，不能叫敌人捞到一寸布。

当天夜里，全厂工人立即行动起来，手拿、肩扛、车推。为了避免被厂外铁路上巡逻的国民党岗警听到，工人们在地上铺了草包、烂席。只见人影往返奔忙，却没有很大的声响。初夏的夜晚，从胶州湾吹来的海风，依然带着几分寒意，可是，工人们个个干得汗流浹背。只用了半夜的时间，六十个仓库的四万匹布，就全部妥善地运到了各车间几十条秘密通风的地洞里去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下午，几十辆蒋匪卡车，气势汹汹地驶到工厂门前，守卫在门口的护厂队员把木棒一横，几十辆卡车歪歪扭扭地停在了门外。这时从车上跳下一个蒋匪头目，骂骂咧咧地走到护厂队员面前：“老子奉政府命令，前来运布！”只听一阵哨子响，工人从厂里各个角落一齐涌向厂门口。大伙手持各种武器，高喊道：“布早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赶快滚吧！……”这小头目看到这阵势，把匣子枪一挥，指使匪徒往厂里冲。工人们手持武器齐唰唰地站成一道人墙。

这时，工人队伍里站出一个人来，他就是护厂大队的总指挥、地下党员老朱。老朱一步跨到匪徒们的



面前说：“布，早叫你们抢光了，你们要是不信嘛，”他一转身对工人们说：“放他们进去看看！”工人们也齐声应道：“好！放他们进去看看！”

这一伙匪徒胆颤心惊地穿过愤怒的人群，向大仓库奔去。他们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挨个仓库看了看，仓库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堆堆木管，乱七八糟地堆在那里，连块布条都没有。他们无法，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跳上卡车，夹着尾巴跑了。身后传来工人们一阵嘲笑声。

春雷似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胜利的喜悦鼓舞着人们。大家都盼望着快快天亮。工人们连着几天几夜不睡觉，站岗巡逻，守卫着工厂，准备着最后的斗争。

六月一日早晨，敌人最后的破坏开始了。一伙全副武装的蒋匪兵，扛着炸药包冲进工厂，妄图炸毁发电所的发电机。早有戒备的工人，立即冲向发电所，发电所周围的工人也纷纷聚集过来。工人们高举各种武器，愤怒地高呼：“谁要胆敢炸毁机器，我们就和他拚了！”“誓与工厂共存亡！”匪徒们原想炸毁发电机就跑，哪知被工人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一步也动弹不得。拳头、棍棒、鸟枪，在他们眼前挥舞着。面对着怒不可遏的工人，匪徒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有

几个匪兵吓得连手里的炸药包也掉在地上。工人们趁这个机会顺利地缴了这伙亡命徒的枪。

六月二日上午，青岛上空，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大地。一队队精神抖擞的解放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青岛。青岛解放啦！成千上万的人簇拥在马路的两旁，欢迎亲人解放军，庆祝人民翻身得解放。中纺一厂护厂大队的工人们，也高举着横幅标语，挥舞彩旗，涌向街头，他们眼含热泪，激动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六月三日，军管组来到了中纺一厂，一座完整无损的纺织厂回到了人民手中。